

从“苗乡探奇”到“发展自觉”：民国时期凌纯声等 与石启贵湘西苗族调查研究比较

吴合显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吉首，湖南 416000）

摘要：田野工作中，根据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否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可以将研究视角大致分为主位（etic）和客位（emic）两种类型。主、客位的研究取向和学术定位不一致，通常会陷入对同一时期同一研究对象的反映大相径庭的困境。探寻采取哪种身份更能真实反映研究对象固然重要，但分析知识生产过程中大的时代背景以及研究者的学术经历、社会地位以及调查动机对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更具现实意义。本文比较民国时期凌纯声、芮逸夫与石启贵的湘西苗族调查研究，透过他们表征在外的主位、客位身份，试图从时代背景、学术经历、社会地位以及调查动机四方面来深入理解他们民族志里分别凸显的“苗乡探奇”与“发展自觉”的特点。

关键词：湘西苗族；苗乡探奇；发展自觉；凌纯声；芮逸夫；石启贵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Harris）认为，人类学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研究人类文化行为：一种是研究者以局外人身份了解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另一种是研究者以局内人身份诠释本民族的文化行为。前一种研究称为客位研究方法（etic），后一种研究称为主位研究方法

（emic）。^[1]在民族志知识生产过程中，局外人（outsider）与局内人（insider）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背景等不一致通常会陷入对同一时空研究对象的描述大相径庭的困境。20世纪30年代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我国民族学先驱蔡元培先生委派凌纯声、芮逸夫两位学者，到湘西开垦民族学处女地，苗族学者石启贵承邀协助工作。他们在乾城、凤凰、永绥三县苗乡实地考察三个月，1947年《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问世。凌、芮两位先生离开湘西后，石启贵受聘为补充调查员，继续从事湘西苗族实地调查研究。1985年由后人整合其《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和《湘西兄弟民族介绍》成书《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本文比较民国时期凌纯声、芮逸夫与石启贵的湘西苗族调查研究，透过他们表征在外的主位、客位身份，试图从时代背景、学术经历、社会地位以及调查动机四方面来深入理解他们民族志里分别凸显的“苗乡探奇”与“发展自觉”的特点。

一、从“客位”到“主位”的湘西苗族研究

在民族志生产过程中，研究者采取“主位”或“客位”身份势必会影响其民族志的价值取向和特点。凌纯声、芮逸夫作为“局外人”，以“客位”身份研究我族¹，突出对我族文化的探奇行为；石启贵身为“局内人”，以“主位”身份表述我族全方位的实景，唤醒我族民众权利争取和发展建设的自觉。

(1) “客位研究”与“苗乡探奇”

最早对中国苗族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局外人是日本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1902-1903年对中国西南诸地的苗族进行了调查，归国后写成《苗族调查报告》，内容涉及苗族名称演变、地理分布、神话、体质、语言、风俗、服饰、乐器等方面。^[2]此后，国内学者在惊叹国外学者亲历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的勇气之余，也纷纷付诸于实践，凌纯声、芮逸夫先生于1933年春夏间对我族的实地调查就是突出个案之一。

凌纯声、芮逸夫于1933年5月至8月对我族地区的凤凰、乾城、永溪三县进行调查，1947年调查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问世，成为国内学者我族研究的处女作。^[3]但凌纯声、芮逸夫的“局外人”身份影响了他们对我族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特点。笔者认为《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最突出的特点也就在于对我族记录中体现出来的探奇行为。

笔者认为凌、芮二人的探奇行为来源于对我族文化残余(cultural survival)记录的使命。凌纯声、芮逸夫先生认为湘西鼓舞是我族原生文化中值得记录的部分：“湘西苗族的文化虽较落后，然在其保存的原始文化中，并非一无可取。如鼓舞、技击等，都有保存的价值，而尤以鼓舞最能引人注意……”^{[3]150}虽然湘西苗族鼓舞很有记录价值，但是“近年以来，地方政府屡次出示严禁苗中淫祀，因此跳鼓舞一类的鼓舞，已不常举行。而苗中稍受教育所谓有识之士，谈及他们的鼓舞，常引为奇耻大辱，以为是暴露他们野蛮的特征。数十年后，这种可以表示民族性的鼓舞，恐将消灭，兹将调查所得，详述如下……”^{[3]150}从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凌纯声、芮逸夫也意识到鼓舞在湘西已经过时，而且还被认为是有损民族形象的活动，但是他们坚持认为鼓舞习俗是体现我族精神之物，所以尽管这类文化行为已经过时，凌纯声、芮逸夫仍不遗余力地占用很多篇幅，把湘西鼓舞划分为单人舞、双人舞；槌舞、拳舞两种分类，并且图文并茂的依次展示了22种槌舞、8种拳舞的舞姿、舞步。^[3]这样浓厚的民族文化探奇色彩为我们认识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因此饱受后来学者的批判。王建民、麻三山就认为此民族志“……为了体现出湘西苗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新鲜感，他极力

¹ 笔者是土生土长的湘西苗族，之所以采用“我族”代替“湘西苗族”，是因为笔者觉得这样更能体现笔者对湘西苗族族别的尊重自觉和认同自觉，同时也是对我族研究先驱石启贵先生最好的纪念。

去调查苗乡中的一些已经陈旧过时、已经鲜为人知的习俗，并不惜笔墨对这些习俗进行描述”。^{[3]11}

不能否认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不仅填补了学界此前对我族研究的空白，而且丰富了国人对苗族的认识。实践证明，凌、芮二人的调查研究为民国政府认知和构建边疆和族别添砖加瓦，还为后人对我族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依据。

(2) “主位研究”与“发展自觉”

凌纯声、芮逸夫极富探奇色彩的实地调查引发了我族精英的不满，一方面部分民族精英向蒙藏委员会致函，指责凌纯声、芮逸夫：“以苗俗古陋，多方采集，制成影片，以为谈笑之资、娱乐之具、谋利之用”；^{[3]12} 另一方面其他我族精英如石启贵，则通过学术活动深入苗区调查撰写成书以正视听。石启贵是凌、芮二人在湘西调查时的助手，在他们离开之后，石启贵受聘担任“补充调查员”，继续进行调查研究，1940年写成《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初稿，1951年又编写了《湘西兄弟民族介绍》，1985年由后人整合《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和《湘西兄弟民族介绍》成书《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该书是我族学者编著的第一部我族专著。在《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石启贵以“局内人”的身份，充分彰显了他对本民族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关注。苗族历史、地理概括、经济生产、歌谣、语言等都得以很详细的记述，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凌纯声、芮逸夫调查的缺憾。例如苗族历史方面，石启贵论证了凌纯声、芮逸夫并没有明确在著作中体现的“苗汉同源论”，他通过从苗汉之由来、苗语歌曲、华苗名称起源、医药干支、姓名同一和宗教习俗六个方面加以论证，论述苗汉由合而分，由同而异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其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告诉人们：苗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他们是兄弟关系，共同创造了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又如在我族的经济生产方面，石启贵不仅记述了土靛染法、纺织绣剪等手工艺，而且还详细描述了烟酒生产、榨碾碓磨等经济生产活动，细化了凌纯声、芮逸夫在此方面粗线条的调查，向读者呈现了全方位的我族实景。

然而，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石启贵民族志中涉及到我族的政治司法、教育卫体、诗赋词章、苗疆建设等内容，这些内容在凌纯声、芮逸夫的民族志中是没有的。政治司法方面，石启贵认为苗胞在政治上缺乏权利，例如：“……查湘西数十万苗民，于此机关，殆无一人参加会议”；“……遍查省内各机关团体中公务人员，多系汉人，未闻有一位苗民任职其间”；“地方遇有县行政之扩大会议时，执政长官，漠视苗民……”，“……没有特殊权利享受，往往不达苗人身上也”^{[4]186}，与苗胞缺乏政治权利同时还有汉族对苗胞的歧视，诸如“苗碗苗筷”、“苗相苗行”、“苗房”、“苗气”、“苗音”等轻视性称呼，大声疾呼应

该设法打破这种失衡；教育卫体方面，石启贵指出“苗族僻处湘西，原为专心耕凿之农人，文化经济，俱落人后。已往向无教育可言，教育设置尚需完善……”^{[4]215}“建议政府对湘西苗疆要稳定治安、注重建设。改良待遇，推广教育，关怀苗疆，以期同跻平等”^{[4]216}；由于石启贵熟悉苗族医药，所以他还从外科、内科、妇科、儿科、医畜五方面详述了苗族医药的治病方法；此外石启贵也记述了苗族武术的一些拳术秘诀。诗赋词章也是石启贵民族志中的亮点之一，他通过实地调查采集资料，汲取了我族各地的县志等文献资料对我族的诗、赋、文、联进行了记载。最后，苗疆建设方面石启贵提出了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司法等九方面的方案，并最终归纳苗疆建设的方案为开导、开诚、开化、开发四大步骤。

与凌纯声、芮逸夫二人苗乡探奇行为不同，石启贵的“主位研究”向读者呈现了多角度的我族实景，其发展自觉行为为后人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争取少数民族政治地位的提

高和经济文化的建设、促进民族团结和苗汉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影响民族志价值取向的因素研究

上述可见研究者采取“局外人”或“局内人”身份势必影响其民族志的价值取向和特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石启贵作为凌、芮二人的补充调查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拓展方面石启贵显得更胜一筹，这使我们在理解凌纯声、芮逸夫与石启贵著作特征时又陷入沉思，因为研究者在田野点的时间和空间上拓展的程度会直接影响民族志生产的过程。那么，如果假定凌纯声、芮逸夫与石启贵有相同的调查时间和调查范围，那么二者民族志的价值取向会不会存在上述的差别呢？让我们试图从研究者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各自的学术经历、社会地位和调查动机来探索这个问题。

（1）时代背景

在狼烟四起的20世纪30年代，认识和构建中国的边疆和国族成为国内知识分子的重任，由于在“民族”的概念下，许多民族学者认为诸如苗族等少数民族已经相当汉化，把他们视为“汉族”的一部分。^{[5]215}在此时代场景下，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调查是建立在“苗汉同源论”的基础上的，他们认为汉族和苗族在民族起源和文化上同源，同时在传统节日、风俗、习惯等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这就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的“民族大同论”等学术观点。但是，苗、汉之间且又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文化特征上。因此，凌纯声、芮逸夫的我族调查主要是为了探奇苗汉文化的差别，把调查聚焦于苗族文化、聚焦于展示和挖掘苗族文化的“苗性”和“他性”。^{[3]3}由此也就造成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强烈的文化

探奇色彩。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场景中的学术氛围影响到了凌纯声、芮逸夫的民族志生产。

从著名学者李绍明先生对《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评价中亦可反观民国时期国人对于西南少数民族族别认识的混沌。李绍明先生认为《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所涉及的“苗族”超出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之后形成的“苗族”范畴，包括了湘西地区长期与苗族杂居的土家族。^{[6]1-2}他列举该书提到的苗官中的土司、苗族客教、苗族故事中关于杨芳的传说均系土家族所有，由此佐证了前述观点。当然以后人之明来评价前人研究的局限，似乎有失偏颇，但应该充分对当时的社会背景作一番分析之后方能理解当时凌纯声、芮逸夫使用的“苗族”概念。凌纯声、芮逸夫在我族调查之时，正值中国西南和南方边疆的非汉民族亟待分类与识别的时期，学者之间有许多疑惑和争议，对于西南各族群却只能以“苗”、“蛮”、“夷”等泛称。^{[5]215}凌纯声、芮逸夫虽然肩负民国政府构建和认识边疆民族的重任，但也脱离不了当时混沌的民族识别的时代局限性，将现今识别出来的土家族列入苗族一并调查在所难免，加上湘西地区苗族和土家族长期散杂居住更是加剧了这种现象的产生。

就石启贵而言，正是那个时代场景下民主革命的潮流、实业教育以及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等因素促成了他在其著作中关注我族发展，进而突出“发展自觉”的特点。石启贵“在省城学习期间，正逢我国思想界和科学界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从小就生活在贫穷落后和‘民族牢狱’之湘西的石启贵，对当时民主革命的潮流和实业教育最易接受。”^{[3]3}石启贵接受了民主革命潮流和实业教育的思想，求学完毕之后还自费去大城市参观游学，后又在湘西多所学校任教并进行教育改革试验。如此一来，长期关注苗族经济和教育的石启贵在其民族志中体现出相应的内容也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也直接影响了石启贵的知识生产。辛亥革命胜利后，虽然明文规定，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主张民族平等，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只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把五族以外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统统置之化外，不予承认。^{[7]163}1937年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最初公布只有蒙、藏等族有240名指定代表，而对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则一个名额都没有。后来石启贵受众多苗胞之托写信反映此时给国民政府，“苗民历受政治经济压迫，五千年来不堪言状，以无人代表参政之原因，故得不到均等享受之利益。”^{[4]6}这其实是体现了当时的少数民族政策，民国时期只把蒙、藏等民族直接纳入统辖范围之内，赋予相应的政治权利，而对于苗族等少数民族则是由于缺乏政治权利而政治经济利益受损。石启贵这一主动为我苗胞谋求参政权利的举措，深深的影响了我族研究的民族志，其民族志就是为石启贵表达我苗胞政治诉求，争取政治权利的最佳媒介。

(2) 调查动机

研究者的调查动机直接能影响知识生产的深度和广度。《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序言开篇就点明了当时我族研究存在的空白：“近百年来，西洋教士传教我国，外国学者旅行来华，做了不少民族学及语言学的工作。他们所发表的论著，颇多可供学术研究之资。而于我族，则至今尚付阙如。日本鸟居龙藏于1902年旅行我国西南各省进行实地调查苗族生活，虽曾路过湘西，亦未能入苗区工作。故湘西苗疆，今尚可称为民族学工作的处女地。”^[31]为了填补这项空白，成为凌纯声、芮逸夫进行湘西研究的最直接目的。但是，在填补空白的同时，最为重要的是为了认识我族的实际状况：“1933年5月初，为了摸清湘西苗的实际状况，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受蔡元培的委托，从中央研究院前往湘西等地调查……”^[32]由此，真实反映我族状况成为凌纯声、芮逸夫进行我族调查的最终目的，那么究竟我族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凌纯声、芮逸夫在时代背景、社会地位以及个人学术经历的引导下，又视“苗汉同源论”和“文化残余论”，只能突出文化范畴，由此也就导致了其民族志里的苗乡探奇的色彩。

凌纯声、芮逸夫乘着“求真”的研究动机于政局混乱之时，在湘西采取了重点关注我族文化的调查行动，自然引发了我族精英的不满，转而状告并传达到了蒋介石那里，后蒋介石责令凌纯声等人汇报事情原委，凌纯声则声明：“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欲知苗族生活之真相，非借标本影片不足以表现。多方采购标本及摄制影片，正所以求真，而保存其文化之特质也……”^[8]凌纯声针对我族民众的不满，解释了制作影片等手段的目的，至于他们在制作影片和调查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关注倾向则是深深隐藏于此目的之下。在研究者动机的“面具”下，研究者的研究倾向实际上有诸多选择，这就涉及到了研究者身份、时代背景、社会地位、学术经历等因素的影响了。

延续和补充凌、芮二人在湘西调查，是石启贵作为补充调查员进行我族调查的主要目的。由此，石启贵的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沿着凌纯声、芮逸夫开创的研究领域，其内容包括地理概貌、历史纪略、经济生产、生活习俗、政治司法、文学、语言、艺术、教育、医药、体育、信仰崇拜、苗乡建设等方面。对解放前的我族社会、文化习俗及历史传统等各个方面，都作了全面的忠实的记录。但作为我族知识分子的石启贵深感当时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严重，深知边疆少数民族备受歧视，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因此为了沟通苗汉两族之间的交流和维护民族团结也成为了他进行实地调查的目的之二。例如1940年他在编写《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初稿的“编辑说明”中的写作目的就显示了他的研究动机：“本书编辑，是为沟通苗汉，化除隔阂，集中意志，统一行动，促进苗汉之自由联合，以期团结，共奋起来……”。^{[4]8}由此，书籍的内容也就“编材侧重发扬民族，启迪民智、扶植民力，提振民气、

以养成苗族良好习惯……”^{[4]8}石启贵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其在试图构建我族研究体系。但由于解放前时局的混乱，环境的艰苦，解放后他又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致使他的计划没能实现。

（3）学术经历

研究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的民族志生产，同时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经历也会左右着知识生产。凌、芮二人1933年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我族考察是他们构建、认识边疆和国族过程中的调查之一。

凌纯声（1902-1981），江苏常州人。191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曾留校任职，7年之后留学法国，就读于人类学家莫斯等门下学习人类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学组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边疆教育司司长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去台湾，曾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等职。芮逸夫（1898-1994）为《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第二作者，毕业于前东南大学外文系，1930年起后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助理员、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助理员、副研究员等职，去台湾后，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组主任、台湾大学考古学人类学系教授等职。从凌、芮二人的生平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二人都是受过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训练，特别是凌纯声还师从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先生。关注文化研究，讲求细致入微，不厌其烦，这与其导师莫斯教授对外族文化（archaic culture）研究兴趣有很大关系。此后凌先生还根据我族调查以及其他大型调查写成了《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一文，并专门在实地调查研究方面编写《民族调查表格》，奠定了中国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基础。

苗族学者石启贵，从小生活在苗区，深感我族人民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因此他渴求文化、好学上进，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入长沙兑泽中学，毕业时获“诚朴多才”的奖评。后考入长沙群治法政大学，接受了当时民主革命的潮流和实业教育的思想，因此大学毕业之后他还当掉家中水田，集资前往京城和沪、汉等大城市参观游学，学会了照相、织袜、养蚕等技术，并购买了照相机、织袜机、卷烟机及安徽纺纱机、水稻良种等带回家乡。不久之后，他任教于乾城模范小学和女子小学，与此同时他还指导家人进行开发山区的试验活动，并且积极组织乾城县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等。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受命到湘西调查，石启贵担任助手，以此为契机，逐渐走上了苗族研究的道路。石启贵心系我族发展，多次向上级行政官员提倡“民族平等”，例如1936年还作为少数民族代表与湖南行政官员磋商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事宜，要求湖南省“关怀边疆”；1946年以湖南土著民族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提出了“民族平等、教育开化边胞，发展苗区经济建设……”等意见。^{[4]3-6}

由此，石启贵在民族志中关于我族政治司法、教育卫体、诗赋词章、苗疆建设等方面的内容正是他学术生涯的写照之一。

(4) 社会地位

与时代背景和学术经历一样，研究者的社会地位往往会左右知识生产的价值取向和特征。凌纯声、芮逸夫二人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又在教育部任职，来湘西调查之前，在学术界和政界，已享有盛名。1933年他们二人受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委派来湘西开垦民族学处女地。凌、芮二人肩负中央政府对我族调查研究的官方使命。石启贵就是由当时县政府部门安排担任凌、芮二人助手的。在当时“官本位”思想盛行的中国，凌、芮二人在老百姓眼里俨然是中央派到地方考察民情的大员。在考察过程中，他们无时无刻得到地方政府的特殊保护。由于当时湘西匪患猖獗，苗民“野蛮霸道”，湘西王陈渠珍还专门派有士兵跟随凌、芮一行进行调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为展现民族“和谐”，地方官员在交谈中尽量回避民族矛盾，还有计划地安排凌、芮一行进行实地调查，这样也就很容易掩盖行为事实的真相，忽视我族人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笔者猜想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凌、芮二人每到一处，看到的应该是我族人民“祥和”、“稳定”的表象。地方官员的“为官之道”，现今的中国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当老百姓一看到荷枪实弹的士兵，应该连说话的底气都不足，更不要说轻松交谈，吐露心声了。从这一层面上分析，也就难怪凌、芮二人的著述里更多的是关注我族文化事实，而极少反映我族民众的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了。

与凌、芮二人较高的社会地位不同，我族学者石启贵出生我族农家，从小务农，生活艰苦，平民百姓一个，与我族人民有着深厚的血缘感情。由于生在湘西、长在湘西，石启贵深知边疆少数民族备受歧视，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由于当时湘西地区匪患猖獗，社会极不安宁，加上缺少地方政府的安全保护，石启贵的实地调查，比凌、芮二人的调查要困难得多，艰苦的多。石启贵下乡调查有时一天要翻山越岭步行七、八十里，途中常遇危险，甚至还要被搜查捆绑。石启贵脚穿草鞋，手持竹杖，顶风冒雨，走遍湘西乾州（今吉首）、永绥（今花垣）、古丈、保靖，贵州省的松桃、铜仁县的一些地方。他的足迹遍布湘西和黔东的曲径小道；他的声音回响在苗民的耳际；他“不慕浮名不畏难，芒鞋竹杖遍山间”；他为“求明了真相，考察时待人诚恳，查询无遗”；他“遍访边民悉苗情”，常和苗家老人促膝长谈，共枕而眠；苗民有难处他热情相助。他到县府、乡府找官绅苗王，拜访寨王，诚心诚意向他们求教。正是因为石启贵的平民身份，因此他在调查苗情、记录苗俗的过程中，更能搜集和揭露阶级矛盾、阶级压迫，最终启发我苗胞阶级觉悟。对民族权利、苗乡建设、倡办实业振兴苗乡经济

方面提出的意见，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结语

上述表明即使假定凌纯声、芮逸夫与石启贵在我族有同样的调查时间和调查空间，那么两者的民族志是否还有这样的差别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单纯的从凌纯声等、石启贵的“局外人”、“局内人”的身份来理解他们民族志里所体现的“苗乡探奇”和“发展自觉”特征，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再假设凌纯声、芮逸夫与石启贵在调查的时间和空间上相等，他们的民族志还是会各有千秋的，因为试图在调查时间和空间上均衡的努力相对于时代背景、他们各自的学术经历、社会地位以及调查动机来说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此看来，认识和理解知识生产过程，不能单单停留在研究者外显的身份上，而应该对整个大的时代背景、研究者的学术经历、社会地位及调查动机有所探究。如今，我族研究已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和重视，但多数学者还是喜欢把研究焦点集中于我族历史文化，对我族发展、振兴之路的探索还是相对较少。笔者认为当今我族研究不能总是再啃“老本”，而是应该向前辈石启贵先生学习，积极探索帮助我族发展、脱贫致富的路子，唤醒我族民众的文化自觉、政治自觉，最终实现自觉发展。

参考文献

- [1] Harris, M. *The Nature of Cultural Things* [M]. Random House, 1964.
- [2] 鸟居龙藏. 苗族调查报告[M]. 国立编译馆译. 台北: 国立编译馆出版社, 1951.
- [3] 凌纯声, 芮逸夫.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 [4] 石启贵. 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5] 王明珂.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M]. 华夏边缘.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6] 李绍明. 民族学研究在湘西的开创和发展[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2).
- [7] 石建中. 苗族学者石启贵[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1991 (4).
- [8] 王建民. 中国民族学史: 上卷[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7.